

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逻辑的再审视

靳涛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厦门 361005)

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走完了宪政转轨才能称得上完成了经济转型,宪政转轨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一个国家没有发生宪政体制的变化,自然不能算是完成了经济转型,其国家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观点是荒唐可笑的。

关键词:宪政改革;经济转型;内在逻辑;再审视

中图分类号:D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5)05-0089-03

一、不发生宪政改革经济转型就一定不能成功?

按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的说法,转型是“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眼下,该词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1]这种说法代表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大部分主流学者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如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中,对转型的内涵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他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限的经济变化和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另一类是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地向市场转轨。^[2]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3]科尔内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4]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政治方面)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成经济体制方面的转轨。他强调,“体制的特殊品性”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体制的特殊品性”。转型必定是“品性”的改变。^[5]

当然,在界定转型内涵时一些学者界定了“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关系,当然也有人把Transition理解为“过渡”和“转型”。^[6]总的来看,过渡、转轨和转型所指的内涵基

本相近,而改革和转型则有明显的区别。按照西方学者如科勒德克和科尔内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称之为转型而只能称之为改革。其实,如果按这种逻辑来理解转型和改革,那么中国的改革和前苏、东国家从50、60年代开始持续几十年的改革就没有区别。那么,中国从完全的计划体制到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怎样解释?其中引导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的量变和质变如何界定?这说明上述对转型内涵的简单界定存在某种欠缺和模糊,因为它没有给出经济体制转型为什么必须以宪法制度的变革为基础?一个国家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虽然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即可以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如资本主义可以和市场体制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相结合(如德国法西斯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印度的中央计划体制等);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计划体制(如目前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体制(如中国和越南目前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展时,其国家(地区)和政体也是一个独裁的政体,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但它们也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才逐步开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他们和西方学者倡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方式也是完全相反的。

可见,虽然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宪法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

收稿日期:2005-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JL403)《从推动20世纪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践透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价值》。

作者简介:靳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转型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

的,那种认为只要宪法制度和政体没有变化,就不能达到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和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原教旨主义观点。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制度)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未深入地给出一个理想的回答,而古典经济学家更是不能对社会制度系统的发展演化给出一个系统的理论和框架。在马克思之前,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并融入经济分析之中是没有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视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化进行了系统和辩证的演绎。

另外,把改革与转型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它明显割裂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如果把“市场改革”和“向市场转型”合并起来观察,那么,这场波及地区广泛、卷入人口众多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型的探索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和动态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方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都忽视了这两个过程的有机联系,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也无法对转型中的经济运行规律、绩效、目标有一个公认合理的评价。

二、转型内涵的透视与解析

转型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因为各自的研究主要缘于各自所代表的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框架和思路。转型就一般意义来讲通常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严格来说转型不仅仅涵盖经济体制本身,它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现在人们谈到转型问题时争议特别大,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界定清楚转型的内涵和大家所谈论的转型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所以,研究转型必须首先界定清楚转型的内涵和研究层次。从目前来看,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对转型问题的看法,

转型实际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次转型是指文明转型,即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变,如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型到后工业文明等等。这个层次上的转型持续时间长,并且从转型过程和形式来看大都是通过渐进方式达到的。第二层次的转型是指社会转型,即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型,如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及从前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转型。在这个层次上衡量转型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转变。这个层次的转型相对于上一个层次时间要短,转型方式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渐进的。第二层次的转型结果和方向总的来说会受到第一层次转型的影响和制约,因为制度包含“主观设计的法律性规则(正式约束,如宪法、法令、法规等)和理性继承的认同性规范(非正式约束,如习惯、道德、行为准则等)”,^②后者对社会转型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后者是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第三个层次转型就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这个层次上的转型研究主要是关注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把社会政治的其它方面作为重点来考察。第三个层次的转型会受到前面两个层次的制约和影响,一般来说,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社会的转型又通常会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但社会的转型不一定会导致文明的转型,同样,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所以,界定了转型三个层次的关系,对于转型研究非常重要。

另外,就第三个层次的转型内涵来看,转型的概念又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来说,转型就是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过渡;^③而从狭义来说,可以把转型简单理解为从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过程。通过上述对转型层次和内涵的界定,我们在谈到转型问题时,就可以更明确,更清晰。

三、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关系

宪政改革属于转型的第二个层次,而经济体制转型则是转型的第三个层次。宪政改革属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范畴,而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经济基础变化的范畴,在界定了上述关系和内涵后,再看待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其实关于这个

问题马克思早已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逻辑思维中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方面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关于结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方面最基本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与之相对应。在马克思看来，完整的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马克思对由生产力决定的唯物史观做过如下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发生变革。”^[2]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首要基础，这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3]在此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形式的出现，又会引起生产组织的变化，而生产组织的变化又会引致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引起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中，马克思清晰地表述和说明了在生产力发展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也清晰表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秩序，那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改变与之不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会逐步变化到上层建筑方面。许多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历程和实践也清晰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是非常正确。

从目前转型的进程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以宪政改革来带动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试验已遭受了巨大的失败，这一后果也让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转型观重新反思。正如科勒德克认为：“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休克’而无疗法的所谓

‘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换句话说，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2]针对有人认为在“休克疗法”的过程中，经济衰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时，科勒德克给予了积极地回击：“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对将来的某种‘投资’，而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正如试图用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4—1996年下降20%来假设其在2000—2003年的增长约30%显得荒诞一样，……经济增长史中没有在有时滞的增长与衰退之间存在这类因果关系的例子，特别是在一组因素导致生产下降而另一组因素导致上升的情形中。”^[2]罗兰也认为，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演进过程，它的演进是受演化惯性和路径依赖影响的，任何超越自然规律“拔苗助长”式的激进过渡和主观构思的“美好蓝图”式的理性设计都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罗兰，2002）。虽然西方一些学者也承认了这种简单化、激进式的转型策略的失败，但他们并不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保持政治体制和宪法秩序相对稳定国家转型方式的成功，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一个特例，如萨克斯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开始改革进程的，而苏、东地区则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不仅存在转型问题，还同时存在发展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4]另外，马丁认为中国成功取决于国内的高储蓄、国内稳定、较好的利用外资、工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独特性；^[5]而拉笛则认为，中国的成功被夸大了，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特别对中国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言，所以，对中国的成功现在预言还为时尚早（拉迪，1999）。

其实，西方学者之所以在转型问题上把经济体制转型与宪政改革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在他们潜意识中市场体制是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模式相联系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和计划体制、专政体制相联系的，在这种带有有色眼睛的原教旨主义思维中，认为不放弃社会主义，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说成功转向市场经济呢？

西方学者之所以把宪政改革作为判断转型的依据，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眼中看来，社会主义是和计划体制、公有制、专政体制天然结合在（下转第95页）

艺术情有独钟之外，还与近五十口人的大家庭的生存命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李渔的戏曲理论像他所从事的戏曲活动一样自始至终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性。李渔撰著戏曲理论、揭示曲文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最终都是为了有效实现他的实用功利目标，即“砚田糊口”。这种实用功利性的客观效果不仅娱己，而且娱人，有利于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这恰恰是戏曲作为通俗文学所不可缺少的本质规定性，是符合广大市民百姓欣赏戏曲的趣味和心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造就了他的著名的戏曲理论。艺术的辩证法源自生活的辩证法。李渔善于发现社会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着互相矛盾对立的不同方面，善于发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进而处于有机统一之中的复杂现象。这些现象为李渔生成关于创作曲文的艺术辩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矿藏和不竭的源泉，不啻说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学说亦是贯穿戏曲艺术的普遍哲理。

综上所述，李渔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探讨是在

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李渔揭示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融会贯通的本质，从而使李渔所建构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反之，它又有力地增强了李渔戏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大大地提高了李渔戏曲理论内涵的美学品位，使李渔戏曲理论体系别具一格，为促进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0.
- [2] 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22.
- [3] 李渔.闲情偶寄[A].李渔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1、24、19.
- [4] 李斗.扬州画舫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46.
- [5] 吴梅.顾曲麈谈[A].吴梅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59.
- [6] 汪季思.论郭启宏的新编历史剧[A].郭启宏剧选[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92：7.

责任编辑：包礼祥

（上接第91页）一起的，而共产党则更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象征，如果共产党不倒台，社会主义还在继续，怎么能说前社会主义国家成功转向市场经济呢？他们把经济体制和宪法秩序等政治体制混为一谈，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西方学者眼中，他们往往认为宪政改革和私有化是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在成功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地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思想是唯心的。

注 释：

①“体制的特殊品性”具体表现是指：（1）政治力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特征。它们之间的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5）。

②从广义上来说，其实在一个经济体制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转型，如从不发达的自由市场体制过渡到发达的有调节的市场体制等。当然，对于转型的理解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参考文献：

- [1]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1：505.

[2]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3]（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4、5、6）.

[4] János Kornai.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 no.1, Winter 2000, pp.22-27.

[5] 吕伟.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罗仲伟.诺思，等.译者序言[A].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周冰、靳涛.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及其决定[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0]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April 1994.

[11] Martin Raiser. Lessons for from Whom?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cs-Transformation, vol.7, No.2, 1995.

责任编辑：包礼祥